

祝勇 /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读大师

激情的归途



中国卷

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

却见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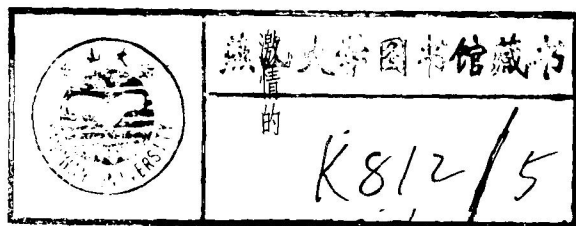
最苦的人格

一个孤独的人





重 读 大 师



0312196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祝勇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4 重印

(重读大师·中国卷)

ISBN 7-02-002911-6

I. 重… II. 祝…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141 号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6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4 次印刷

印数 13001-16000

定价 18.40 元

序

《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言之，成为大师，有两项条件：有造诣、被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决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 与 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他们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人们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当人们试图透过对大师的解读逼近原始的历史，更发现历史已经被他们垄断。大师是山峰也是鸿沟。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了。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

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失语。像孔子说的：“予欲无言。”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我们实在不能断定大师的存在是成全了我们还是妨碍了我们。

朋友说：“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这确是悖论。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对经典的阅读，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阅读开始之前，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

也许，“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反读”这个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读”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恰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

如前所说，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然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换句话说，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以绝对看相对，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反会觉得大师在“变”，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除了与其本身的“含金量”有关外，更与阅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即：所谓大师，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因而我们说，大师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贬值的自然过程。

于是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个理念。“重读大师”不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重读大师”，完全可以衡量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准与社会开放度，衡量出文化发展的平均值。

于是也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两本书（中国卷和外国

卷)。这两本书的编选，完全出于一种偶然的契机。当最初的动议得到圈子里几位朋友的一致支持后，便义无反顾了。困难是有，之所以一口气编完，是出于对其价值的肯定。我从一开始就有信心将它编成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所幸的是平日的阅读已经使我具有了“原始积累”，即使是回头重找，也毕竟是心中有数，同时开始以此为专题进行大范围的阅读，以补充视野里的盲点。一段时期内，我奔波于图书馆与研究所之间，埋头于资料堆中。当下中国优秀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为这两本书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以至于全部书稿完工的时候，心中真是充满喜悦与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集子谈论的大师，皆为社科人文类，而不涉及自然科学类，且均为近世人物。原因是编者并不打算将其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只想展现近代人类人文精神的演进。尤其对近两个世纪的文化反思，对每个有精神要求的当代人都至关重要。取舍尺度，一在见地，人云亦云者不取，投劄演说者不取，最好说些不流行的话，要个人视角，总之，要凸现“重读”的价值；二在写法，虽不强求行云流水，但一定要不枯涩，文体介于随笔与论文之间为最宜。如此，或可多吸引几位读者。向出版社捧出这两卷厚厚的书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既解说了历史，亦诠释了现在，既完成了对历史的追述，亦完成了对现时的叙述——我们把自身的精神状态，留在了历史的刻度表上。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特别是王培元、李明生两位先生，在编辑过程中与我反复磋商篇目的取舍，并提供了部分稿件供我选用，他们的许多工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编辑范畴，而更具创造性。感谢钟嵘小姐的装帧设计，这次合作同以往一样默契和愉快。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读者，读者的

购买使得本书有了再版的可能。

不再多说，现在让我们来读——“重读大师”。

祝 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五日 急就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改定

序

目 次

辜鸿铭	且说辜鸿铭·····	单正平 (1)
康有为	“圣人”心迹·····	夏晓虹 (7)
蔡元培	昨夜启明之星辰·····	吴 方 (18)
章太炎	说“士”·····	吴 方 (27)
梁启超	寂寞身后事·····	夏晓虹 (38)
王国维	王国维的忧郁·····	黄学祥 (53)
李叔同	其淡如水·····	孙 郁 (60)
鲁 迅	一个人的爱与死·····	林贤治 (67)
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心态·····	吴中杰 (84)

- 陈寅恪 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 (93)
- 文化遗民陈寅恪 林贤治 (105)
- 胡适 毛与胡适 郁之 (111)
- 郭沫若 太阳下的蜡烛 李辉 (129)
- 梁漱溟 关于梁漱溟 孙郁 (144)
- 顾颉刚 痛苦的人格分裂 王学典 (155)
- 吴宓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周国平 (167)
- 孤怀卓犖殉道真 唐振常 (179)
- 冯友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单纯 (186)
- 金岳霖 走出阁楼以后 许纪霖 (196)
- 茅盾 身后的寂寞 孙郁 (209)
- 朱自清 长长的背影 钱理群 (218)
- 闻一多 激情的归途 许纪霖 (228)
- 2 梁思成 第十二座雕像 曾昭沅 (240)

沈从文	另一种纪念碑	李 锐 (247)
胡 风	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王富仁 (255)
巴 金	还巴金以历史的公正	陈琼芝 (261)
周 扬	摇荡的秋千	李 辉 (284)
吴 晗	可怜一觉开封梦	许纪霖 (295)
钱钟书	亦论“钱学”	伍立杨 (306)
曹 禺	永远的雷雨	王 蒙 (313)
顾 准	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石 冷 (321)
	两个顾准	林贤治 (330)
	只有一个顾准	李慎之 (336)
汪曾祺	道不自器 與之圓方	李 陀 (347)
高 阳	灯火阑珊	舒 禾 (361)
王 瑶	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	钱理群 (371)

且说辜鸿铭

单 正 平

第一次知道辜鸿铭，是在八十年代初。读一些回忆录，其中讲他在北大教书时，常在课堂上大骂崇洋的新派人士，说西洋许多东西中国古已有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位老先生经常说一些负气的话，是情绪化的即兴表达。时隔十多年，近读海南出版社新出辜氏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感觉其中大多数说法也是近于情绪化的表达，并非冷静的理性思考。这倒应了辜氏的见解：中国人是主情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一种如沐天恩的心境。皇帝退位，天恩无法再沐，那平和的心境自然没有，于是就有了诸多并不理智的情绪化的奇异见解。惟其不理智，反倒让人一开眼界，甚或还颇有启发，一如尼采的哲学。

辜氏在一次大战期间向欧洲人发表讲话说：“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将带来革命和混乱。且后者比前者更糟。因此，现在我对欧洲人民的劝告是，不要招

回教士，为了善的缘故也不要招进群氓，而只需招进中国人，招进那拥有良民宗教，历二千五百年之久，用不着教士和军警，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真正的中国人。”

什么是良民宗教？辜氏回答很简单，就是对皇帝的绝对的忠诚。“孔子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国教中宣传并给予了中国人这个绝对的忠君原则。”至于忠君的中国人如何帮忙管理欧洲、教化欧洲人，辜氏未置一词，我们当然一派茫然。

在《中国妇女》一文中，他说：“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又说：“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人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在我看来，中国的好些纳有群妾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官员是自私的，那么我将说那些摩托装备的人不仅自私，而且是些懦夫。”“我真怀疑在一千个普通欧美人中，是否有一个能在同一间房里拥有一个以上的女人而不把家变成斗鸡场或地狱的。”一般妇女如此美好，慈禧太后更不得了。辜氏颂扬她“是为世所公认的伟大女性，她具有一切伟人共有的品质——纯朴。”说慈禧伟大也许不错，若说她纯朴，可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他这么颂扬皇太后，并非因一睹天颜、身沐天恩后的感激涕零，他未有此等幸运。他只是从德龄所著《御香缥缈

录》一书中发现了太后的纯朴。倘若照此方法，大约姚文元辈也能在“文革”报刊中发现证明江青更纯朴得不得了呢。

辜氏评论欧洲民族，也是出自一种奇怪的印象。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因此他们都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只有法国人能理解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法国人虽然没有上述三国人的深沉、博大、纯朴，但却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精神特质：灵敏。这个灵敏对认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至关重要。辜氏又接着说，上述诸国人，只要认真研究中国，就能弥补他们天性中的缺陷。这就让人纳闷：既然英、美、德三国人有缺陷而无法理解中国，何以研究中国就可消除其缺陷？我不敢钦服辜老先生的见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人、中国妇女的观点不合事实，对西方人的评论也似是而非，没有让人信服的道理。

我许久以来一直纳闷，像辜鸿铭这种聪明绝顶、留学欧洲逾十年的人，何以能成为如此极端的保皇党，以至于连纳妾蓄辫缠小脚种种陋习都大加赞美？同时代留学者已然不少，但没有任何一人像辜氏那样极端。思忖良久，我想这大约与他从小在马来西亚而不是在国内长大有关。他从欧洲学成归来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北京上流社会的一切，显然所知不多。他对当时社会的了解，更多是在张之洞幕中那些年，像他这样一个抱了认祖归宗的愿望回来的游子，若不被北京伟大的帝王气象征服，反倒不自然了。北京的皇城可能会散发出使人心甘情愿地臣服的魔力。所以他才断定中国人精神中最可宝贵的是忠君。而同样的意思，在鲁迅那里被界定为奴性。看来奴性也好，忠君也好，其为普遍心理，大概是不错的。二十年代，冯玉祥带兵进京把溥仪从宫中撵

走，胡适对此表示异议。逊清王室或溥仪本人曾对胡适表示过嘉许或感谢。胡适闻知即有受宠若惊之感。虽说这见于传闻的事未见得可靠，但那种“感觉”的真实当无可怀疑。胡适是最典型也最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十年对国民政府蒋介石本人多有指责抨击毫不畏缩，但对倒塌王朝逊位皇帝却那么在意，可证忠君或奴性在中国是一普遍情结，很不容易消解，即使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我们这一代人倘生在一个世纪以前，或半个世纪前，那奴性或忠君情结也许当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二十年前的心路历程足可证明我们普遍有此“美德”。

而像辜鸿铭那样顽固忠君到大义凛然的境界，却也是当今人望尘莫及的。当年蔡元培先生容忍大骂辛亥革命的辜氏在北大教书，即有人极表反对，而蔡先生不予理会。他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也到了大义凛然的境界。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审判“四人帮”后，让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指定大学里开设政治宣传学、望文生义学、文字狱史、阶级斗争批评学诸课程，让江青讲样板戏、讲“三突出”创作原则，那会有怎样的效果？把这几个宝贝的才华给埋没在监狱里，是有些可惜了。依张东荪先生所发挥的思想自由原则（思想倘使不与行为直接相连则任何危险思想都不含毒素）论之，则“四人帮”在讲台上放毒，当不会导致“文革”复辟。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只有一个蔡元培，张东荪也为数极少，一般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习惯于不让别人讲话（“文革”中的口号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更何况当权者。“文革”后许多受害知识分子对播放样板戏有过敏过激反应，正说明他们太过情绪化，缺乏容忍“言论自由”的胸怀。他们可能忘了或者不理解蔡元培先

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却又允许保皇党的辜鸿铭大放厥词。现在知识界又有人高喊不宽容，作为个人态度固然无可厚非，但在社会舆论层面上，不宽容的潜在含义就是独裁，虽然言者也反对独裁。

这纯属操心。我们再回到辜鸿铭。假若天才的辜鸿铭生于国内，长于国内，然后留学，然后回国，我想也许他比胡适更激进也未可知。又假若他当年有幸蒙慈禧重用，委以批判西方文化及国内数典忘祖之激进派、革命党的重任，那他的笔头肯定比张春桥、姚文元厉害得多。可庆幸的是他没领受圣命，他只是个人言论而未转化成政治行动，否则，以辜老先生的愤慨与坚决，若真像他希望的那样总理国政，那掉头的就不只是六君子了。辜鸿铭曾向来访的英国文豪毛姆表示，他“有总理国政的才能，可是没有皇帝可以把重权信托他”。我们真该替陈独秀、胡适、鲁迅们庆幸。

我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不同，同一人的见解会截然不同。许多情况下，人对亲眼所见的东西反倒认识不清，所谓熟视无睹。辜鸿铭游学欧洲，后半生在中国，他对欧洲及中国的认识不客气讲大都是模棱两可的偏颇之见。他未去美国，反倒对美国人的看法较接近实际，这真是让人惊奇的事。他在《美国人的心态》一文中说，美国人“是一帮孩子——一帮伟大的早熟的孩子。当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仅仅是些物质世界的简单的实体或东西时，如同伐树、屠宰、烧炒贝壳之类时，他们的智力还能够信任；可当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是非物质世界的错综复杂的事情时，比如像教育、宗教、文明和国际法等事情时，那么美国人的这点起码的、本来有用的常识，就变成了应抛弃的、简单的、直观的和非常危险的无知和扯淡了。事实上，我想在此指出，何以美国人尽管综

合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睿智，而在与各种各样的骗子打交道时却要轻易地上当呢？其原因在于，普通美国人的智慧、甚至受过良好教育人的智慧只不过是起码的常识，是聪明的动物的智慧而已。……如果人们能够记住美国人是一帮孩子。……那么，人们就能马上理解，美国宗教社会与机构的单纯，美国内部政策的喧嚣、无聊和欺骗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笨拙、愚蠢和不可靠了。”虽然这有点老爷爷观察小孙子的味道，大人不记小人过，日子长着呢，你们慢慢地长吧等等天朝心态，但大体上还是不错的。证以今日美国国内的现状及国际上的所作所为，足见辜老先生确有过人的敏锐与深刻。